

·客家研究·

# 客家文化视野中的清代赣南农村市场<sup>\*</sup>

谢庐明

(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所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 清代赣南农村市场发展的历史,既是经济的过程,又是社会的过程。宗族利用其自身势力,或筹建墟场,或向墟市渗透,或控制墟市,反映了客家传统社会双层架构的特点,庙会因其地域性、整合性、经济性和社会性,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习俗对赣南农村墟市经济的运行也有着保障和导向的影响。因此,经济与文化形成互动,客家文化因素在清代赣南农村市场形成地域性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整合作用。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农村墟市 地域性

中图分类号 C912.82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3)02-90-04

## 一、引言

农村市场史是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而又有待于开拓的领域,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热点<sup>①</sup>。但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外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宏观区域理论和中国集市体系理论以及台湾学者提出的祭祀圈理论,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中国农村市场的实际有较大的出入,故而需要进一步开展区域市场的实证研究,以修正其理论构架的不适应性。而从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领域看,仍然局限在江南和岭南部分城镇;从研究内容看,重于经济而略于文化;从研究方法上看,重于文献而轻于田野调查;从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情况看,也主要局限在赣北和赣中。迄今为止,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仍未系统展开<sup>②</sup>。赣南地处江西南部的丘陵山区,又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以赣江——大庾岭商道为代表的全国市场体系与赣闽粤边经济区在此重叠。同时,赣南属客家文化区,历史时期又是社会急剧变动的区域。可见,对客家文化背景下赣南农村市场的探讨在学术上极具典型性。

经济社会学在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市场机制和特征时认为:“文化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③</sup>因此,笔者试图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引入历史的印证,无疑这也为农村市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所谓客家文化,据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理解,是指客家民系和客家社会所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具有群体性、传承性、整合性。本文拟融历史学、经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为一体,采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sup>④</sup>资料相结合,力图从清代宗族、庙会、习俗与赣南农村市场的关系等方面,实证文化因素对农村市场机制和特征的影响。由此为构建中国的市场体系理论提供支持,同时,对促进赣南农村市场中的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仍具一定的现实意义。

## 二、宗族与清代赣南农村市场

清代赣南的农村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势力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在赣南农村墟市网络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墟市的建立到运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族的烙印。

首先,在赣南农村墟市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宗族利用其自身的势力,筹建墟场,设市贸易。赣南乡村多为宗族聚集而居,单姓村落占绝大多数,且族必有祠,宗族文化氛围浓厚。宗族组织的发展和宗族势力的强大是赣南客家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色。赣南明代以前就已有不少宗族自行开设的墟市,以古老墟市

\* 收稿日期 2003-01-23

作者简介 谢庐明(1966—),女,江西南康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客家文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① 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研究,可参见钟兴永《近十年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关于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可参见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黄志繁《大庾岭商路·山区市场·边缘市场: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戴利朝《近代赣南墟市变迁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但对赣南农村市场中文化因素的分析,仍十分欠缺。

③ 笔者以南康、会昌、大余、石城为点,对赣南农村墟市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

所占比例最大的宁都县最为典型,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 宁都县明以前农村宗族建墟情况表

名称	时间	建立者	资料出处	名称	时间	建立者	资料出处
肖田墟	北宋	肖氏	《兰陵肖氏九修族谱》	青塘墟	唐	何氏	《沪江清溪何氏三修族谱》
东韶墟	北宋	曾氏	《宁都曾氏仲诚公十二修族谱》	田埠墟	南宋	陈氏	《玉田陈氏六修族谱》
洛口墟	唐	朱氏	《沛国朱氏八修族谱》	赖村墟	唐	赖氏	《雩邑大溪赖氏四修族谱》
小布墟	南宋	王氏	《太原郡宁都龙门王氏十修族谱》	固厚墟	南宋	古氏	《横塘古氏六修族谱》
钓峰墟	北宋	罗氏	《豫章罗氏十一修族谱》	田头墟	北宋	黄氏	《雩阳车溪黄氏九修族谱》
石上墟	南宋	李氏	《石溪李氏九修族谱》	长胜墟	南宋	潘氏	宁都潘氏重修族谱》
蔡江墟	北宋	胡氏	《旸霁胡氏十二修族谱》	固村墟	南宋	刘氏	宁石长乐刘亨刘氏三修族谱》
湛田墟	唐	宋氏	三评事宋三府君墓碑	琳池墟	元	丁氏	《洛阳丁氏初修族谱》

资料来源 宁都县地名办公室编《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1984年

到了明代,宗族自行开设墟市已非个别县份。如瑞金县“瑞林墟,明万历谢氏迁此建墟”,壬田墟,明代蔡氏建墟;合龙墟,明代谢、杨两氏迁此建墟;谢坊墟,明天启陈、刘两氏合伙建墟。<sup>[2]</sup>再如于都县,“葛坳墟,明中叶葛氏开墟”,段屋墟,明初段氏开墟;黄龙墟,明中叶邹氏开基,利村墟,明末黄氏开墟。<sup>[3]</sup>

清代中叶赣南山区的开发过程基本完成,尤其是闽粤客家的大量迁入,移民与市场关系更加密切,宗族设立的墟市日渐增多。如会昌县筠门岭墟于明万历中期梁国栋从福建省迁此搭棚卖烟茶尔后成墟,清代一直是闽粤赣的商品转运枢纽、交通要冲,为赣南四大名镇之一,市场规模及贸易额远远超过县城。再如崇义县“杰坝墟,范、黄两姓从广东迁此,后建墟”,恩顺墟,清乾隆十七年朱姓迁此建墟,<sup>[4]</sup>再以于都县情况佐之,“高兴墟,清中刘氏从福建宁化迁入,后建墟”,“宽田墟,清初郭氏开墟,“禾丰墟,清代刘、曾两姓建墟”。<sup>[3]</sup>

由此可见,赣南的族墟为数不少,国家与基层社会自治结合的双层架构在此表现得很典型。宗族在社会结构中不仅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而且其地位也相当重要。

其次,宗族千方百计向墟市渗透,通过征税获取商业利益并控制地方,因此,赣南农村市场中冲突和斗争的现象也大量存在。例如兴国县的江口墟,原为“徐氏在今老墟建,后杨、钟两姓于清乾隆六年(1736年)在现墟开墟,与老墟对抗,因徐氏不得人心,老墟不攘而废。<sup>[5]</sup>再如信丰县古陂镇上的大姓谢氏家族,在清中叶创造出“席狮”年节仪式,以展示其家族势力。后来,该墟镇旁势力渐盛的另一大姓黎氏家族,也于光绪年间创造出“犁狮”年节仪式,与谢姓展开墟镇控制权的争夺。同时,赣南是明清时期重组的移民社会,土客之间争夺墟市的斗争也与农村市场发展过程相伴随。这在上犹县营前墟最为突出,有明一代,土著陈、蔡两姓堪称大族,蔡姓在墟旁筑蔡家城。清初客家大量迁入,尤其是康熙年间的“甲寅之乱”后,黄、胡等客籍姓氏获得大发展,从此改变了土客之间的势力格局。但营前墟地基是朱、陈、蔡三姓的,客籍人要做生意,每个店铺每年必须向朱、陈、蔡交税,这种现象沿袭至清末才基本消失。<sup>[6][P290]</sup>

再次,在墟市管理与控制上,赣南宗族实际上是官府牙行之外更为重要的力量。宁都县黄陂墟清初以来已经形成为盐行、夏布行、草席行、茶叶行、油行、小猪行、药材行、竹木行、铁匠行、杂帽行、石灰行等13个专门行业。所有行业都要定期定额缴纳落地税银。税银由墟中大族廖氏牙人收取后交到武昌祠,再由武昌祠统一向官府缴纳,多余部分则留作祠堂众产。<sup>[7][P65]</sup>甚至还有一些偏僻墟集私立墟长,自行抽税,垄断墟市。康熙年间,兴国县方太等八墟私立墟长,“凡遇货物到墟,无非刻意勒索,或一两抽至三四分、五六分不等,名为牙用,实同轧作。……甚至勾引匪类潜入墟场,或开赌博攫金,或窝私贩取利。若地方小有事故,即把待武断,鱼肉村愚。<sup>[8]</sup>龙冈墟桀恶尤甚,江背峒一名赤勘墟,又有营前墟、江口墟者,皆以其地所在名之,奸氏自称墟长,皆公网利,弱者肉食。<sup>[8]</sup>

总之,赣南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往往是宗族组织与市场活动的互动过程。由此也进一步论证了经济人类学的观点:传统初级市场不是由经济控制的,而是由亲属关系来控制的。<sup>[9][P155]</sup>因此,施坚雅在涉及中国传统农村基层市场并用西方理性经济人和规范地理学的模式<sup>[10]</sup>来解释时,就不能不面临着一些理论的挑战。<sup>[11][P112—147]</sup>

### 三、庙会与清代赣南农村市场

庙会构成了赣南区域基层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经济文化网络。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庙会,也体现了清代赣南地域社会的特色。笔者在翻检方志和族谱时发现,赣南有大量神庙及祭祀的记载。庙会以祀神、祈福演剧而聚众,商人因此设市贸易。因此,庙会不仅是文化象征体系,还是社会经济的体系。考察赣南庙会,总的

来说,它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和功能。

其一,地域性。庙会以庙为中心,是赣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道德、伦理和各种信仰观念的具体产物,文化内涵也有别于其他地方。清代赣南民间神庙系统中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地方神(如于都的吴生佛、瑞金的冯侯神、宁都的朱公神),又有外来的区域神(如各县的许真君神),以及全国性的神(如关帝、汉帝)。在赣南客家地区,墟市贸易不仅是庙会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乡村庙宇祭拜的场所。如瑞金县“英显庙”又建于壬田寨。九月十三日(冯侯)诞辰,彼处起墟,集三省货物,庙食甚显。<sup>[12]</sup>清康熙《瑞金县志·祀典》再如于都县黄屋乾君庙庙会,始于清代,庙会的主题是给许真君拜寿。庙会期间,庙门口两旁、戏台下、路旁各种服务摊点所设的香烟、纸烛、副食、玩具、日用百货等,被群众视为吉祥物,具有“避邪”作用。正是因为当地群众的这种观念,许多货品供不应求,曲洋墟也因此热闹非凡。<sup>[12]</sup>崇义县茶滩墟每年一度的农历八月十三日的“董公庙会”,先期就有四方走贩、百工技艺赶会,相聚成市,数日才散。石城县珠坑墟的米豆、油类多集中在庙内交易,秋溪墟每逢节日前有夜市,尤以端午、中秋节夜市为盛,直达通宵,集祭祀、娱乐、交易于一体。

其二,整合性。考察清代赣南庙会,都以这种整合性特征形成其具体的文化内涵。据实地调查,宁都县小布墟是个百姓聚集的墟市,墟市周围各姓祠堂林立,后建许真君庙,以庙会的形式,统率周围七十二村半,以调节姓氏之间与村落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神明信仰与墟市贸易的巧妙结合,保证了小布墟的长期稳定并成为宁都上三乡粮油、土纸、夏布、竹木等的中心市场。此外,清代中叶会昌县和长汀县共同举办的归龙山庙会十分兴盛。当地人认为八月十五之前神明管福建,庙会在长汀境内举办,八月十五之后神明管江西,庙会在会昌举办,庙会期间,娱神娱人的消闲娱乐色彩浓厚,交易频繁,盛况空前。因此,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促进了赣闽边界两地因方言、习俗相近的经济社区的形成。

其三,经济性和社会性。赣南庙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异常突出。清代瑞金的庙会因祭祀对象的不同分为观音会、真君会、福主会、花神会与罗光会等。庙会期间,不仅迎神竞技,演唱古戏,走亲串友,甚至开台聚赌,而且同时交流货物,始终伴随着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城县高田将军庙会与牛马岗会。据调查,高田墟每年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主要有下元、中元、将军庙会,届时都有祭神、打醮演戏、游神等活动,庙会期间,贸易繁荣超过了县城。清代中叶开始以牛马交易著称,每年九月,四方客商云集,热闹非凡。清末,会期改在十月,盛况如前。时安徽商人运来大批驴马出售;广东商贾来此采购驴马;福建人来此购买耕牛;浙江商人贩来百货;湖北客商贩来大批羊裘;江西樟树等地客商前来经营药材、土特产品和驴马生意。牛马岗会盛时,曾汇集过七省数十县客商。外地客商何以要到偏僻的石城北部山区小镇进行交易呢?据口碑所传,都认为将军庙会期间打醮和下元期间送瘟神能避邪,高田牛马买回去不会死,能赚大钱。故而高田将军庙会因为神明崇拜缘故而成为商业、文化中心。可见,赣南农村集市不只是经济空间,还是社会、文化——象征的场域。单纯用经济的观点,确实是难以解释地方市场发展的特点的。

#### 四、习俗与清代赣南农村市场

对习俗作市场分析颇具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他从市场角度为“习俗”下了如此定义:“习惯、惯例、前例以及根据它们推论出来的习惯假设,我们解释为习俗”。<sup>[13]</sup>赣南农村墟市受习俗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习俗对清代赣南农村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习俗对农村墟市经济的运行有着保障作用,并对消费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内陆山区,赣南商品经济和墟市虽然不断发展,但直到明代“民鲜商贩,惟务农业,风俗俭约”;“民务耕而不商”;“民惟力耕,不知贩负”。<sup>[14]</sup>明嘉靖《赣州府志·风俗》有清一代,赣南人少有经商者;“郡邑列肆而居者,皆远乡大贾,……异乡作客,赣人绝少”。<sup>[15]</sup>清同治《赣州府志·风俗》而且墟市的设立过程并非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实地调查表明,由于客家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赣南墟市的设立、布局、走向受宗族伦理、风水观念、民间信仰的影响很深。市场消费风俗主要有:以喜庆、团聚为中心的节日消费风俗;以祭祀纪念为特色的节日消费风俗;以游乐、社交为目的的节日消费风俗。明显呈现出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资源环境、风土人情等方面制约的地域性和多样化特色。此外,墟市交易活动必须熟悉自古沿袭下来的一系列族规、不成文法、习惯等老规矩,按惯例办事,如赣县七里镇的永清堂作为赣南木材交易仲裁组织就非常有名。

另一方面,习俗还对市场贸易起着导向性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赣南市场由于地理、商品结构及客家文化的因素与闽西、粤东市场呈现较强的联系,体现出边缘化的特点。明中叶以来,赣、闽、粤毗邻地区经济联系较密切,并形成经济上的互补性。清代乾隆之后,赣闽粤边经济区域正式形成。<sup>[14]</sup>以瑞金、石城、定南、寻乌等县墟市为例,瑞金壬田墟就是闽赣两省6县的重要贸易场所。石城县竹子坝为赣南通往闽粤陆路的交通要道之一,省内产的大米、花生、烟草、夏布、土纸等多在此集散,然后肩挑销往福建的宁化、长汀和广

东的兴宁、梅县,同时输入食盐、海产品等。定南、寻乌等县因与广东梅县毗邻,出入商品多以广东为渠道,当地俗有“无广不成墟”的说法。寻乌在边界贸易中一向处于中转地位,吉潭墟作为寻乌交通和经济的中心之一,寻乌、瑞金、会昌的油米、牲畜以及广东的盐等货物在此集散,赣闽粤三边区域的客商云集于此。故此,寻乌的边际贸易,民间素有“牛穿草鞋、猪坐轿、狗排队”和“盐上米下,活的下死的上”的说法。<sup>①</sup>可见,吉潭虽然只是寻乌一墟市,但却发挥着沟通三边区域贸易的中心市场之作用。因此,在这互动的市场网络中,墟市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并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活力。而客家文化因素在赣闽粤边经济区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致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客家文化区与赣闽粤边经济区重叠在一起。所以,经济社会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经济不是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宗教信仰的综合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说经济(如市场)决定社会与文化,还不如说社会与文化塑造了经济,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共同塑造了文化。<sup>②</sup> (111 P145)

### 五、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农村墟市中客家文化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清代赣南客家地区的墟市具有自身的一些文化内涵与地域性特征。在赣南农村墟市网络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宗族利用其自身势力,或筹建墟场,或向墟市渗透,或管理控制墟市,反映了客家传统社会双层架构的特点;清代赣南庙会因其地域性、整合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构成了赣南区域基层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经济文化网络,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赣南农村墟市受习俗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明显,习俗对农村墟市经济的运行起着保障、导向作用。总之,清代赣南农村市场的历史,既是经济的过程,又是社会的过程。墟市与宗族、神明信仰、习俗等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客家文化因素在赣南农村市场形成地域性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入研究客家文化背景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实为认识客家传统社会的一个崭新视角和重要契机。

### 参考文献:

- [1] 朱国宏.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2] 瑞金县地名办公室.瑞金县地名志[M].1985.
- [3] 于都县地名办公室.于都县地名志[M].1985.
- [4] 崇义县地名办公室.江西省崇义县地名志[M].1984.
- [5] 兴国县地名办公室.兴国县地名志[M].1985.
- [6] 徐正光.聚落、宗族与族群关系[M].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2000.
- [7] 刘劲峰.宁都县的宗族、庙会与经济[M].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02.
- [8] 张尚瑗.漱水志林.艺文·道里考[M].
- [9] 周大鸣,乔晓勤.现代人类学[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97.
- [10]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24. 1—31964—1965.
- [11]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12] 罗勇,劳格文.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M].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7. 91—92.
- [13]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76.
- [14] 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2).

责任编辑:李自茂

## Gannan Rural Markets in Qing Dynasty On the Aspect of Hakka Culture

XIE Lu-m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akka at Gannan Teachers' College,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annan rural markets in Qing Dynasty was the history of its economy and society. Clansmen used their power to build markets, to interfere markets or to control markets, which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aditional double-framed Hakka society. Its fairs were rich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s because of the regions, integr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Customs ensured an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Gannan rural markets. So its economy and culture were reacted and Hakka cultu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nnan rural markets.

**Key words** Hakka culture, rural market, region

① 中共寻乌县委党史办编《寻乌县文史资料》,1986年10月,第65页。